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英语〈非英语专业用〉第六册 文史分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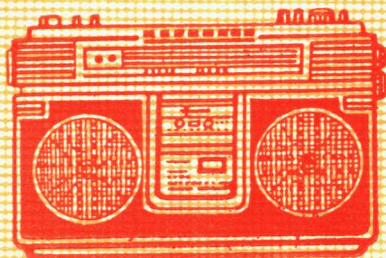
教学参考书

6

南开大学公共外语教学部教材编写组 编

ENGLISH

务印书馆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英语〈非英语专业用〉第六册
(文史分册)

教学参考书

南开大学公共外语教学部教材编写组编

商务印书馆

1991年·北京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英语〈非英语专业用〉第六册
(文史分册)

JIAOXUE CANKAO SHU

教学参考书

南开大学公共外语教学部教材编写组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942-1/G·151

1991年10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08千

印数 0—900册

印张 3¹/₂

定价: 1.30 元

使用说明

本书为高等学校文科(非英语专业用)英语教材第六册(文史分册)的教学参考用书。内容包括课文、补充读物的参考译文及练习参考答案。

本书所提供的中文译文仅供教师在教学中参考使用。第六册教材(文史分册)中有的练习可能有多种答案,但本书只提供一种。由于练习是围绕着课文而编写的,故遇有多种答案时,似应以本书所提供的答案作为第一选择为宜,以便达到复习、巩固在课文中所学到的语言知识的目的;在此前提下,可将其他答案作为第二、第三选择。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周荣启副教授和刘守兰副教授的大力协助,对此我们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本书中的缺点和不妥之处一定很多。欢迎同志们批评指正。

南开大学公共外语教研室教材编写组

1989年2月

目 录

第一课.....	
第二课.....	5
第三课.....	9
第四课.....	14
第五课.....	19
第六课.....	25
第七课.....	30
第八课.....	36
第九课.....	40
第十课.....	44
补充读物.....	50
练习答案.....	97

第一 课

比哥伦布更早抵达美洲的龙舟?

1975年冬,潜水运动员鲍勃·迈斯特利尔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斯·维迪斯近海处的黑黝黝的海水中发现了一块圆形大石块,该石块的正中部位有一个洞。他将该石块搬了起来,把这个重305磅的物体移到潜水器具贮藏室里。潜水教练员韦恩·鲍德温在贮藏室里看见了这块石块。鲍德温透露说,他几乎在完全相同的地点发现过一块类似的石块。他们俩人对那一地区进行了搜索,结果又发现了大约三十五块这样的石块。他们将其中的五块搬出了水面。

在此期间,迈斯特利尔店铺中的一张这种石块的照片传到了詹姆士·莫里亚蒂第三那里。莫里亚蒂是圣地亚哥大学的历史学和考古学教授,而且是一位古代航海技术的研究者。经过五年的研究,莫里亚蒂和他的助手拉里·皮尔逊确信:这些石块很可能是远在两千年以前遭难船只上的锚或其它装置。

人们并未发现这艘据推测在海上遭难的船只的其他遗迹;不过,考虑到搬出水面的最大一块石块达半吨多重,莫里亚蒂和皮尔逊估计:那艘船的长度超过一百英尺,船上的水手至少有五十名。在离海岸更远处发现的两块石块被验明是船尾锚。这些不幸的水手也许是和一场风暴搏斗过,他们抛下锚以便和风浪作斗争,后来船搁浅而翻了。

这些冒险者是谁呢?科学家们收集起来的线索表明,这些水手最有可能来自一个国家:中国:

古代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和诸如凯尔特人之类的其他人,甚至可能还有罗马和腓尼基的航海者都先于哥伦布到达过美洲大陆的大西洋海岸;在这一点上,学者们的看法颇为一致。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亚洲的水手更早就横渡过太平洋。在帕洛斯·维迪斯发现的石锚又是一个证据。他们的一些船只可能是由风和潮水带到美洲的。其他船只可能是为寻求贸易而后来到的。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地理学教授斯蒂芬·C·杰特认为可能有人比

哥伦布更早和美洲大陆发生过接触；在这方面他是一位最主要的权威人士。他解释道：“看来东南亚曾经是早期船舶发展的发源地。在当代以前，它一直领先于西方。”有些学者对这种横渡太平洋的接触的可能性持强烈的怀疑态度，但杰特认为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这种困难。他坚持认为：“走海路要比走陆路容易得多而且迅速得多。”

有关早期横渡太平洋的证据是一堆逗弄人的资料，其中没有任何一份资料是具有结论性的。在一些有关前往遥远国度旅行的中国著名的传说中，在有关早期西班牙探险队看见过的一些奇怪的、东方模样的船只的报导中，以及在一些从不列颠哥伦比亚到厄瓜多尔所发现的具有明显亚洲影响的物品中，都存在着一些线索。最引人注目的是亚洲和中美洲的古老文明之间在文化上存在着巨大而不可思议的相似性；这里所说的中美洲包括墨西哥的几部分和中美洲。

小埃德温·多兰是一位研究古代船只的专家。他评论道，“从一种纯粹而又受到限制的考古学的环境中在很大程度上是得不到确凿证据的。”他说道，尽管如此，在哥伦布之前出现横渡太平洋所进行的接触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几千年以来简直有数以百计的证据都证明这一点。”将所有无联系的成分凑在一起便能得出一种令人相当信服的事实。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泉州附近所发现的一艘十三世纪后期的船只证实：中国水手所拥有的轴舵和其他技术特征直到十五世纪中叶才为欧洲的航船所采用。对古代中国地理所进行的研究也表明：他们了解遥远的海洋和天体导航法。在公元前二世纪的中国教本中便提到过凭星体指引航向一事。磁针看来肯定是在公元850年之后就被使用了。

拥有这样可靠的技能和船只，从中国到北美是完全可能的。沿着千岛群岛和阿留申群岛，再往下沿着美洲的西海岸，水手可以在距离海岸一百英里以内的陆地上逗留。更有可能的是，水手可能利用一系列这样的水流：这些水流迅速流过亚洲、千岛群岛和阿留申群岛等海岸，流经北美，直到南部的墨西哥；然后经过夏威夷的南面朝亚洲回流。在季风季节，漫不经心的水手常常被风吹得偏离航道而驶进这样的水流中去。

在中国的传说中有其他一些线索。在一部有关梁代的记载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然而却有争议的故事。该故事讲述了一个于公元499年来到中国的和尚，名叫慧显。他提到了一个他称之为“扶桑”的国家，它位于中国东部大约一万三千英里的地方。慧显被带到皇帝的面前，受到一个名叫虞科的封

建贵族的询问。虞科将这和尚的故事记录下来，并加上自己的一些华丽词藻。

慧显报告说，“他们有许多多的‘扶桑’树，这个国家就是根据这种树而取的名。”“这种树的叶子早期呈竹笋状。其果实呈梨状，可食。”慧显描述了驯养鹿和牛的情况，后者“具有长角。”据虞科的记录说，慧显还到过“扶桑”以东大约三百五十英里处的一个称为“女人国”的文明世界。

近年来，美国作家亨利埃特·默茨煞费苦心地试图探索那条据说慧显曾走过的路线。她说道，从中国南部出发，“一万三千英里左右的路程蛮可以把那位和尚”带到南加利福尼亚。她注意到“扶桑”文明与五世纪时龙噶坦和墨西哥高度发达的社会之间的相似性。她假设道，那种叫做“扶桑”的植物是玉米。默茨认为“女人国”可能是一种母系社会，有可能是我们（美国）西南部的印等安人的祖先。

把往事的点滴记载拼凑起来有助于解开这个谜。历史学家莫利斯·G·霍姆斯提起过西班牙的一些文件，其中有关于1576年在墨西哥西海岸外的特累斯·马利亚斯群岛聚集过一些东方船只的描述。更早些时候，科罗纳多的一支巡逻队冒着在太平洋上航行的风险登上这块大陆的海岸以调查印第安人有关“海上房屋”的报告。

不过，在新大陆上存在着什么样的证据使人联想到亚洲的影响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斯密生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克利福德·埃文斯和贝蒂·梅格斯以及业余考古学家伊米利欧·埃斯特拉达在厄瓜多尔的瓦尔迪维亚发现了公元前四千年期间的陶器碎片；这些陶器碎片和同一时期日本九州岛上绳文文化中期遗址的图案极为相似。绳文文化时期的陶器制作于公元前约一万年，而瓦尔迪维亚陶器是迄今在新大陆所发现的最早的陶器。

华盛顿州立大学的人类学教授理查·D·多尔蒂在奥泽特发现了用高碳钢制作的凿子和刀；奥泽特是太平洋西北部的一个印第安人村庄，大约四百年前为泥石流所埋没。多尔蒂说，那些金属物品的含碳量很高，看来和日本在大约同一时期所锻造的金属的成份相一致。

在这些不可思议的类似情况中，十分引人注目的是一种以树皮为原料制作布匹和纸张的方法；这种方法为东南亚人和中美洲(Mesoamerica)人所使用。在这两处地方，很多这种制作过程似乎都是以一种传统的方式进行的——基本步骤有所不同。公元前大约一千五百年时，中美洲南部的人

们在以树皮为原料制作布匹的过程中所使用的石头浆缸和公元前大约二千四百年以来在台湾所使用的浆缸几乎完全相同。

植物提供了另外的线索。山芋看来是在哥伦布时代以前由南美洲传到波利尼西亚的。公元前三千三百年和二千八百年间，人们发现美洲花生栽种在江苏省和浙江省的某些地方，美洲花生可能是在早期的某次航行中带到中国的。

在这方面，大多数学者对于亚洲人先于哥伦布到达美洲并无争议。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些来访在文化上是否有深远的意义。

我们来考虑一下墨西哥的奥尔梅克文化吧，它是美洲最早的伟大文明，曾影响过整个中美洲地区以后的文化。艺术中龙状的形象在公元前大约一千一百年时突然掌握了玉雕技巧，以及某些建筑思想和城市规划思想，所有这些奥尔梅克文明都酷似中国商朝的文明——开始于公元前第十八个世纪的青铜时期的文明。大约就在奥尔梅克人突然掌握了艺术技巧的时候，商朝为周朝所推翻。商朝的杰出人物和工匠可能逃往到新大陆去了。

当莫里亚蒂和皮尔逊开始仔细查看那片船只遇难的遗址时，他们将那些石头中的几块样品寄给其他学者以供作出评价。历史学家弗兰克·弗罗斯特是一位怀疑论者，他断言：那些石锚或系泊器械来自十九世纪中国人建造的船只；这些中国人是作为修筑铁路的工人和矿工而来到美洲大陆的，后来又回到了他们那种以捕鱼为生的传统生活方式。但是有关这样的船只的一些珍贵照片表明：这样的船只使用的只是美洲那种铁制的抛锚系统，而不是石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几名科学家认为这些石锚充分表明古代中国人航行到过美洲。

这些只不过是几块中央部分钻了洞的岩石，但是却是一个具有深远含意的发现。将这一令人兴奋的谜的各个组成部分拼凑在一起时，一幅清晰可见的图象便会呈现出来。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当然绝不会失去他在新大陆的历史地位，但是发现新大陆的荣誉，至少是发现新大陆西海岸的荣誉，也许要属于来自远东的商人、船只的遇难者和冒险家。

(选自《读者文摘》1983年6月)

第二课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I)

维·休·霍·格林

意大利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对于这种说法人们早已感到习以为常了。那昔日的古碑透过深绿色的柏树时隐时现，仿佛是在时时提醒着人们不要忘记古罗马的光荣。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特点是，由于长期以来古罗马的文化古迹一直被现代罗马人当作兴建房屋的采石场，罗马教皇庇护二世便下令保护这些古迹，而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拉斐尔则成了古罗马文物古迹的管理人。然而唤起意大利人重新鉴赏其优秀传统的或许并不是古罗马本身，而是当时的拜占庭帝国。来自土耳其的威胁导致拜占庭的帝王们无视民众的意愿，千方百计地和罗马天主教会联为一体，以谋求西欧对东方的援助。这样，意大利和君士坦丁堡便开始频繁接触起来；两国之间有关神学问题的讨论以及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拜占庭之间的贸易往来使两国之间的接触更趋频繁。肩负政治使命而出使意大利的曼纽尔·克利索娄勒斯后来却留在佛罗伦萨教起了希腊文。后来，一位拜占庭的神学家伯沙利昂通过发表著作对柏拉图进行论述在意大利开创了希腊文化的研究。若不是因为枢机团的主教们一想起这位满脸胡子的希腊主教登上教皇宝座的情景就惊恐万状的话，他或许还会被选为罗马教皇。在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前，许多意大利人便已开始去那里求学。1423年，乔万尼·奥里斯帕带了238份手稿回到意大利。克利索娄勒斯的女婿，柏拉图主义者费尔菲尔佛在君士坦丁堡的图书馆里整整啃了七年书本。

促使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运动最早发源地的还有另一个因素，那就是经济的发展为新课题的研究创造了十分有利的环境。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许多小城邦的君主以及富有的资产阶级都愿意庇护在某种程度上不受宗教义务约束的知识分子；他们时刻都准备承认那些不依赖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出身而取得的个人成就。这些庇护人为人文主义学者们提供他们工作所必需的资金和舒适的环境，并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以示酬谢。虽然当时的许多画家和学者都多才多艺，才华超群，但是他们都被视为“艺术

家”，而不是被看作受雇的工匠。因此乔托虽然不是一名泥瓦匠，可是在1334年却被任命为建造佛罗伦萨大教堂这一工程的师傅以及这座城市的建筑师，其理由是“在整个世界上找不到一个比他更能胜任这方面和其他许多方面工作的人”。又过了近乎两个世纪以后，米开朗琪罗放弃了他在罗马的工作，其原因则完全是因为不堪忍受罗马教皇手下的一些仆人的无礼侮辱。柯西莫·德·美第奇曾颇具同情心地评论过菲利波·李比修士的艺术家气质，他说：“人们必须以对待神灵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具有非凡才能的人，而不应象对待牲畜那样地使唤他们。”事实上他们也时常受到人们极大的尊敬。柯西莫将位于凯拉基附近的那座惹人喜爱的乡间别墅赠送给了马西利奥·弗奇诺；这座别墅便成了柏拉图学院举行会议的地点；在这些会议上与会者都平等相待，没有贵贱之分。克莱夫·贝尔曾这样写道：“佛罗伦萨人……认为他们的艺术是他们国家的最大荣耀。”接着他又加上一句略带偏激的话：“人们在托斯卡纳讨论画家和雕刻家的功绩时，其热烈程度正如人们在约克郡讨论足球运动员和职业骑师的功绩时一样。”这样的局面对后来两个世纪的艺术繁荣起了极为有利的推动作用。

最初，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主要着眼于对拉丁和希腊文学的重新研究，尤其偏重于对古代原著的研究。虽然人文主义是在意大利的中世纪晚期从古典文学的研究中自然发展出来的，然而事实上佩脱拉克和薄加丘也曾尽力鼓励他们的同时代人对那些长期在中世纪的修道院里被束之高阁，任其朽烂的古典文学手稿的内容进行新的评价。那说话刻薄、生活放荡不羁的波基欧·布拉奇欧里尼是一位格调非常高雅的文体学家，而且事实证明他还是一位勤勉的古代手稿的收藏家。（这里所说的“古代”一词系指其内容，而不是指其年代。）例如，他曾于1416年在圣·高尔地区发现了昆提里安的一份无法估价的手稿——《演说术原理》；文艺复兴运动的许多主要的教育观点都源出于这部著作。佩脱拉克则有他自己不可忽视的一面。在为亚里士多德思想和经院哲学的方法论所统治的学术领域内，他同时向这两种权威思想提出挑战。尽管他不懂希腊文，却极力推崇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高明之处，这仅仅是从罗马向雅典过渡迈出的一小步。越来越多的希腊文手稿被带回到意大利。列奥那多·布鲁尼精确地翻译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普利奥把柏拉图的希腊文原著带到意大利。在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和罗马都建立起了柏拉图学院。这些学者们力图把罗马人的德行和希腊人的思想融为一体，并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在人文主义者维

斯帕西亚诺·德·毕斯替奇所著的《出类拔萃之辈》一书中，作者反映出古罗马市民的美德体现在现代佛罗伦萨的爱国热情之中。这种热情既质朴无华，又有些矫揉造作，还带着几分根深蒂固的保守。

起初，这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来说，似乎是一种不会产生任何结果而只是研究文物的态度。它在某种程度上过分强调了文体而抑制了创造力；而拉丁文之所以会变成一种被废弃的语言，这和过分强调文体有很大的关系。老练的教士们察觉到《每日祈祷书》中所使用的拉丁文是不规范的，而这正是《每日祈祷书》需要修订的一个重要原因。红衣主教本波是一位雄辩的代人写信者，他曾告诫萨多莱托不要去念希腊文原版的圣·保罗的《使徒书》，以免损坏了他自己的文体。桑纳扎罗的诗篇《亚加狄亚》在主题和处理上是那样地渗透着古典文学的气息，以致他诗篇中的牧羊人从不在意大利的山岗上漫游。然而古希腊和罗马的重新发现也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扎扎实实地吸收了不少意大利方言。现在，谁也不想再去费神阅读佩脱拉克和薄加丘的单调乏味的拉丁文著作，然而佩脱拉克用意大利文写下的十四行诗却依然那样清新、悦耳、感人，一如这些诗句在十四世纪刚问世时那样。佛罗伦萨的老爷和太太们在乡间修建了用以躲避瘟疫的避难所，在那里，他们以格调清新的意大利散文形式轮流讲故事，借以消磨时光。薄加丘根据这些民间故事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短篇故事。这样，将近一个世纪之后，波利提安便得以用迷人的歌曲去取悦于洛伦佐·德·美第奇的朝廷，这些歌曲情调典雅，但却是用意大利语写成的。1516年，阿里奥斯托的《狂怒的奥兰多》问世。在这部不朽的诗篇中，完美的古典技巧和本族语的结合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古典文学的复兴还使意大利人在其他方面获益匪浅，他们因此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历史学观点，这种观点激起了他们渴望仿效古代雅典人和罗马人的美德的要求。他们同时还获得了一种崭新的自由感，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对知识的热烈追求和对创造新事物的无限愿望。画家们开始尝试在他们着意描绘的人物之间建立起自然的感情联系，这意味着绘画艺术和中世纪早期那种千篇一律而又僵死呆板的表现手法的决裂。乔托一马当先，率先破了例，其他画家则纷纷仿效。于是，乌切罗制定出新的透视画法原则，波莱伏罗热衷于对裸体男子作实物写生；他画的人物生动逼真，隆起的肌肉充满着生命的活力。这种科学态度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全才列奥那多·达·芬奇的作品中可以说是得到了尽善尽美的体现。在达·芬奇之前，从来没有人

能象他那样地领会到在绘画艺术中精确地体现解剖学原则及正确使用色彩的重要意义。遗憾的是，他对实验所怀有的热情使世人未能领略到他的全部创作成果，因为他当年所使用的颜料都早已褪去了原有的光泽。结果，就他那些得以幸存的作品来看，无论是他那不可思议的多才多艺，还是他那深邃的思想意境都没能给人留下一个公正的印象。“好奇心和对美的追求，”十九世纪的评论家瓦尔特·佩特曾这样写道，“是造就列奥那多聪明才智的两股主要动力。好奇心和对美的追求时常发生冲突，但是当两者融为一体时，便会产生微妙而罕见的典雅。”

对知识的强烈追求以及热衷于实验是文艺复兴运动时期佛罗伦萨人的主要特征。如果说，佛罗伦萨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的早春，那么罗马则目睹了它的仲夏，而威尼斯所经历的则是它的晚秋。另外，早在美第奇家族建立起专制国家以前，艺术和文学就在这里繁盛起来了。当时，市政当局还曾耗资修建了一所新的育婴堂，布鲁内莱斯奇负责该工程的设计，而罗比亚则负责装饰。1424年卡里马拉艺术协会的负责人，亦即著名的羊毛商会的会长们委托吉贝尔蒂雕刻了佛罗伦萨洗礼堂的东大门。在当时这个社会里，至少有人作过某种尝试，设法把古代罗马和希腊人民的爱国热情体现于当时的佛罗伦萨的政治生活中，而艺术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日渐臻于成熟。“无论在何地，只要人们认为在自己的国家里有希望获得荣誉时，他们便会有雄心壮志，思想也会随之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列奥那多·布鲁尼这样写道，“而一旦失去了这种希望，他们就会变得懒散，潜力也会日渐消耗殆尽。”在米兰建立起来的一个野心勃勃的专制政府，危及到了佛罗伦萨的安全，正是这样一种险恶的形势才导致柯西莫·德·美第奇的兴起。不论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是在当时的村镇自治体的庇护下还是在美第奇家族的公爵们的庇护下发展起来的，当时的繁荣局面以及人们的多才多艺却是无可争议的。

第三课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II)

维·休·霍·格林

将这一时期的佛罗伦萨的名人一一排列出来就如同对早期文艺复兴运动的历史进行现场连续评论一样。建筑学因布鲁内莱斯奇和利昂·阿尔伯蒂的出现而变得令人崇敬，布鲁内莱斯奇曾设计了佛罗伦萨大教堂的圆顶和著名的圣·斯比利托教堂；阿尔伯蒂的多才多艺令人难以置信，他曾为一位富有的商人设计了罗切莱宅邸。在此之前，他还曾为他装饰了桑塔·玛利亚·诺维拉教堂的正面。他曾这样地总结过自己卓绝的技艺：“作品的各个部分是那样和谐、协调地组合在一起，因此任何增删或更动都只会把作品弄糟。”才华横溢的雕塑家唐纳泰洛也是佛罗伦萨人。卢卡·德拉·罗比亚是通过与众不同的途径蜚声艺坛的。他先是从事大理石雕塑，后来又潜心钻研他所发明的赤陶。他所创作的蓝白相间的浮雕异常生气勃勃，色彩鲜明，反映出他所生活的环境中蕴藏着的丰富的美的源泉。安德烈·维尔罗基欧的杰作《佣兵队长科尔雷尼骑马雕像》则反映了当时生活的另一个侧面；这位长期以来给当时的意大利政局带来骚乱的冷酷无情的军界领袖，其朝气蓬勃而又具有非凡男子气概的个性在那石雕上永久地保留了下来。然而维尔罗基欧和他的弟子列奥那多·达·芬奇相比，则大为逊色。达·芬奇既是古典派艺术的大师（例如其作品《最后的晚餐》），又是浪漫派艺术的大师（例如其作品《蒙娜·丽莎》和《岩间圣母》）。从乔托起，佛罗伦萨的画家便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每位画家都为迅速发展着的艺术增添了一种特色：安杰里科修士的绘画给人一种超脱世俗的宁静；马萨奇欧的绘画富于戏剧性；桑德罗·波提切利则善于将纯朴与微妙融于一炉，他为美第奇别墅所画的《维纳斯的诞生》和《春天》足可印证这一点；达·芬奇则将绘画艺术和科学知识结合起来；米开朗琪罗的作品表现出动态的力量；而拉斐尔的画则表现出宁静的协调。毕斯替奇为学者尼柯罗·德·尼柯里所画的肖像集中地体现了佛罗伦萨艺术家生活的壮丽景象。“首先，他仪表堂堂，生气勃勃，嘴边总是挂着一丝微笑，他言谈风趣……。他坐在桌旁时的姿态完全像古代的

人一样，目睹这样的情景确实令人心醉神移。他总是坚持要求摆在他面前的餐巾应该是最洁白的，正如所有的亚麻布织物一样，都应该一尘不染。尼柯里交游很广，大凡想讨好他的人都向他赠送大理石雕像，或是古代的花瓶、雕刻品、碑文以及出自名家之手的绘画作品，还有嵌花式的碑……。他的家里摆满了各式装饰品；在佛罗伦萨，没有哪户住家能在这方面与他的家相媲美，也没有哪户人家拥有比他所收藏的雅致的物品数量更多；因此，凡是到过他家的人都能看到无数件很珍贵的东西，各种不同欣赏水平的人都能在那里大饱眼福。

随着十六世纪初期的到来，文艺复兴运动的盛世从佛罗伦萨转移到了罗马。造成这种局面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法国的入侵和美第奇家族的衰亡使佛罗伦萨遭受的混乱，但这也反映出文学和艺术始终受到教皇们的关注。尼古拉斯五世建立了梵蒂冈图书馆，他的继承人锡耶纳的艾尼斯·锡尔维乌斯·毕柯罗米尼本人就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学者；作为教皇庇护二世，他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他是一位最慷慨的庇护人。教皇们的这种热情不仅使得罗马帝国的许多古碑得以幸存，免受彻底摧毁之灾，而且还使罗马这座城市增添了不少气势雄伟的教堂和富丽堂皇的宫殿；不过，它也迫使天主教会屈从于世俗的情趣；这样，在随之而来的与新教改革派的斗争中，天主教的势力便大大地削弱了。洛伦佐·瓦拉是教皇的图书馆长，他提倡一种可委婉地称之为伊壁鸠鲁式的生活方式，他曾在一篇显示出才华的评论文中揭穿了《君士坦丁的赠礼》是一份伪造的文件；中世纪的教皇们正是依据这一份伪造文件而建立起他们暂时的统治权的。教皇西克塔斯四世也曾将教皇图书馆长这一职位授予普拉提纳，因为他曾署名写过一部虚假的教皇史。马基雅维里写的小册子《君主论》就是由教皇的印刷工人印刷的。和道德生活相比，枢机团似乎更看重典雅的文体和诙谐的对话。罗马这种堕落只会极大地破坏教会的精神生活。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阿克顿爵士是位罗马天主教徒，他曾这样写道：“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主要事实是：僧侣集团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这些新人所具有的非宗教精神，在这样的代价下，一场（教皇与具有世俗思想的宗教批评家之间的）公开冲突才得以避免，而这些新人是创新派而不是改革派。”具有尚武精神的教皇优里乌斯二世计划重建圣彼得大教堂，米开朗琪罗曾为这位教皇的坟墓的装饰整整忙碌了四十年。1506年教皇优里乌斯二世将这项重建任务交给了多那托·布拉曼特。他把这座教堂设计成一个中心部分突出的建筑物，一改中世纪教堂那种纵向的造型。

佩夫斯纳教授曾写下过这样一段话：“中世纪教堂的主要作用在于把那些虔诚的教徒引向圣坛。然而，在一座完全集中化的建筑物内，这样的活动显然不可能展开……。只有从唯一的中心点去观察这座教堂，才能完全领略到它的效果…。教堂的宗教意义被人性化了。在这样的教堂里，人们再也不前推后拥地向着虚无漂渺的目标迈进了，而是沉浸在美的享受中，并且因为他们自身居于这种美的中心而感到自豪。”年逾古稀的米开朗琪罗被保罗三世任命为圣彼得大教堂的建筑师，负责设计该教堂那个气势宏伟的圆顶；按照设计，这个圆顶最后要安装在这座教堂的顶部。十分具有象征意义的是，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都生于佛罗伦萨，卒于罗马。拉斐尔公正地受到其同时代人的高度崇敬，他的画一直都保持着原有的高贵气派和优雅格调。他的绘画作品，尤其是他的许多圣母画像，或许是文艺复兴运动盛期的最圣洁美丽的作品。然而，他的作品却缺乏米开朗琪罗的那种深度；它们看上去妩媚动人，色调高雅，然而作品所揭示的思想深度却远不能令人满足。这两位画家的肖像间的悬殊差别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拉斐尔明净的相貌带着一脸女子的秀气；而米开朗琪罗的脸却布满皱纹，鼻梁长得歪歪斜斜的，下巴流露出坚毅的神情，他的头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甚至可以说令人感到畏惧。他确实可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真正富有创造才能的最伟大的艺术家。他是一位出色的诗人，正如他是一位出色的雕刻家一样。他所有的作品都展现出磅礴的气势，给人以雄伟壮观的感觉，无论在意境的选择和手法的运用上都无懈可击；他的作品给人一种令人崇敬的难忘印象。他否认自己是位画家，但是他为西斯廷教堂所作的壁画《最后的审判》，正如文艺复兴运动时期所有的作品一样，也是一幅杰作。他的作品中蕴涵着这样一层深刻的思想意义：即在文艺复兴盛期，世俗的人文主义已开始明显地与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天主教徒的虔诚精神融为一体。在担任圣彼得大教堂的建筑师时，他拒绝接受薪俸，并且还主动向新建立的耶稣会（该会建于1540年）提供免费服务。

夏去秋来，商业城市威尼斯由于贸易往来而和东方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成了理想的艺术生活的中心。那里的艺术生活形式生动活泼，内容丰富多样，然而其艺术观念却是贵族式的，甚至是肤浅的。蒂先是这个时期的杰出代表人物。他几乎活到一百岁的高龄，于1576年溘然长逝。因此，他的整个生涯是对文艺复兴运动的评注。他曾从师贝利尼和乔治昂，这两位大师都是威尼斯画派的创始人。1516年他继贝利尼之后担任了威尼斯共和国

的官方画师。他早期的作品充满了鲜艳夺目的蓝、红二色，然而其主题却是以非宗教性的居多。他的后期作品依然保持着丰富的色调和娴熟的技巧，但题材较为严肃，色彩也较为素静。实际上这个时期的意大利和其他地方一样，无论是在绘画或是在文学方面，（如塔索的优秀诗作《耶路撒冷》，与其说这是一部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倒不如说是一部反宗教改革运动的诗篇）以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形式而表现出来的罗马天主教会势力的抬头对文艺复兴运动已产生的影响。因此，宏伟壮观的威尼斯便被宗教势力所利用。艺术大师中最多产的要数托列托了（他是一位继承父业的小染匠），他越来越热衷于创作以宗教题材为主题的作品。他的作品《卡纳的婚宴》不但色彩绚丽，而且是一幅神奇的作品；这是因为他有着真挚的信念：他能创作出他所着意表现的这种奇迹。另一方面，他的威尼斯同乡保罗·维罗内塞创作了一幅同一主题的作品，其精湛的处理手法却无法掩盖其纯世俗观点的实质。人们认为宴会上宾客们的形象实际上都是和他同时代的一些人们所熟悉的男男女女们。维罗内塞曾在圣·赞尼波罗教堂的多明我会的修士们的授意下创作了一幅题为《西蒙家的宴会》的作品。完成后的画面上那绚丽夺目的色彩正如气势非凡的表现手法一样，令人叹为观止。然而，这幅画却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画面上缺少一位故事中必不可少的中心人物——马格达拉的玛丽。宗教法庭的法官们曾责令这位画家出庭，并指控他的做法有失虔诚。后来由于画家去掉了画面上两个令人反感的人物，并把画名改为《列维家的宴会》，法官们才心满意足。这件事尽管微不足道，然而它却说明了一个事实，即文艺复兴盛期那种十分典型的令人激奋的欢乐生活是一去不复返了，而艺术则再次受到以宗教信仰为精神力量的束缚。

尽管如此，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在导致新文化的诞生以及人们对生活所采取的新态度等方面不失为一种奏效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新的学识必然会渗透到所有的大、中、小学。对古典拉丁语的研究意味着要采用新的教材和新的教学方法，从而使学校的课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这些领域内的先驱要数维托里诺·达·弗尔特。他以全面教育为宗旨，于1425年在曼图亚创办了一所学校。他不仅传授有关希腊罗马优秀经典作家的知识，同时还传授礼仪举止，开设体育课程。文艺复兴运动在其初期阶段时带有贵族运动的色彩，它的思想正是通过这些学校而传遍了所有的知识阶层。长期以来，大学一直是旧思想观念的坚固堡垒，然而，新知识也逐渐渗入那里。可以清楚地印证这一点的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都开设了希